

网络反腐发展趋势、特点及对策研究

——基于2004—2013年大数据的分析

□谢金林

(重庆工商大学 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 重庆 400067)

摘要:网络反腐是网民通过网络披露腐败线索,制造舆论,借助网络监督公共权力运行的行动。笔者借助百度、谷歌等搜索引擎,收集自2004年至2013年646例网络反腐事件,对案例编码进行数据化处理与分析,在总体趋势、地域分布、网站分布、涉及对象、处理结果等方面分析了当前网络反腐发展趋势与一般特点,并从现代反腐治理体系建设与反腐能力提升的角度提出进一步加强网络反腐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网络反腐;发展趋势;“触网”;晕轮效应;火箭提拔

2002年广东省政府启动“金财工程”建设,首开运用网络技术改进反腐工作之先河,次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启动网络举报平台建设,中国网络反腐名人李新德创办中国网络舆论监督网,网络反腐在政府与民间两个场域逐步展开。然而,网络反腐发展并不快,直至2008年,在“周九耕事件”、“林嘉祥猥亵案”、“最牛团长夫人事件”等热点事件影响下,形成了第一波网络反腐热潮。十八大之后,新一届中央领导人“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腐决心极大地激发了网民的反腐热情,网络反腐不断发力,上至省部级高官,下至村级领导,各个层次都有官员因“触网”而丢乌纱,网络反腐空前繁荣,众多网民为网络反腐的胜利欢呼雀跃。网络反腐实践发展激发了学术界网络反腐研究热,特别是2008年以后,各种级别学术期刊上大量刊出网络反腐研究文章,网络反腐相关研究项目也纷纷获得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立项,研究成果呈现井喷之势。虽然大量研究文献对网络反腐的现状、特点、发展趋势以及对策等问题都有过论及,但基于大样本数据分析的研究成果特别少,难以全面呈现当今中国网络反腐经验事实^[1]。本文基于2004年至2013年3月份网络反腐大样本数据,对网络反腐的现状、特点、发

展趋势进行分析,并提出进一步加强网络反腐的对策建议。

一、概念界定与数据来源

当前学界对网络反腐界定主要有三种倾向。其一,网络反腐是官方和民间通过互联网实施的直接或间接与反腐相关的行动,这种界定方法显得太过宽泛,将官方与民间通过网络进行的所有反腐行为都包含其中。其二,网络反腐是国家反腐机构通过网络技术和传媒工具听取网民对反腐工作意见、建议、获取反腐线索并查处腐败案件,这种界定方式把网络反腐理解为权威机关反腐工作中运用网络技术,而网络反腐的民间性被遮蔽,其本真内涵没有得到呈现。其三,网络反腐是网民利用网络技术曝光官员腐败行为,利用舆论效应引起官方反腐机构对该行为进行查处,从而形成对行政行为和权力运行的有效监督,达到预防、遏制、惩戒腐败行为的新型反腐形式,这种定义方式对网络反腐的内涵与外延界定更为科学,也比较方便实证研究操作。

笔者更倾向于第三种观点。但是,为了方便操作,本文对网络反腐的外延作出三重限制:(1)强调网络反腐与网络检举的区分。网络反腐是通

收稿日期:2013-12-3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XSH026);第52批全国博士后基金项目(2012M520797);重庆工商大学人才引进项目(1355022)

作者简介:谢金林(1973-),男,重庆工商大学工商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过网络披露贪腐行为,通过网络舆论监督约束公权力的运行,因而具有公开性。网络检举则是通过权威反腐机关设定的途径检举公职人员腐败行为,具有非公开性。(2)强调舆论谴责与网络揭发的区别。舆论谴责是对已经被公开的贪污腐败行为进行舆论批评,而网络揭发是通过网络曝光贪污腐败行为,呼吁舆论关注,以期达到对贪污腐败行为进行惩治的目的。(3)强调首次披露与后续报道区别。我们将网络反腐严格限定为通过网络首次披露贪污腐败行为,而已公开信息通过网络再传播就不纳入研究范围。因此,网络反腐可以定义为,通过网络揭发公职人员或公共权力部门贪污腐败线索,监督公共权力运行的行为。

实证研究最大的困难是数据收集与收集的数据能否全面、客观地反映所研究的问题。网络反腐与纪检部门侦办贪污腐败案件不一样,后者数据比较难获得,而网络却具有公开性、共享性的特点,信息查寻比较方便,而且能够进行个案跟踪。虽然,网络反腐信息收集不会受政府信息公开限制,但由于信息爆炸,信息真假难辨,且权力部门、“公关公司”通过各种途径删帖等原因,100%获取所有网络反腐信息也是做不到的,加之时间跨度太大,即使运用网络舆情监测软件也难以做到。既没有政府部门发布的网络反腐统计数据,也不可能逐条查阅网帖以穷尽所有网络反腐行动,这是研究必须要解决的难题。根据对网络反腐披露信息分析,我们设置“公款旅游”、“公车私用”、“萝卜招聘”、“公款消费”、“官员情妇”、“违规提拔”、“官员房产”、“豪华办公楼”、“豪华会议”、“收黑钱”、“乱罚款”、“天价烟”、“官员名表”、“吃空饷”、“天价政府采购”等关键词,借助百度、谷歌等搜索引擎对相关网帖以及新闻进行检索。为了确保信息的全面性,分别用谷歌和百度各检索一次,然后相互比照并补充,大致确定网络反腐案例数据收集范围。考虑到搜索引擎涵盖的不全面性,以及关键词设定难以全面包含所有网络反腐行为等问题,我们又通过一些网络新闻的扩展报道以及权威机关创办的刊物查阅(如正义网的《反腐倡廉网络舆情》),对网络反腐相关线索进一步补充。通过这样的过程,虽然不能确保数据的100%准确,但是,数据还是覆盖了网络反腐的主要信息,具有较大可信度。

按照上述方法,笔者共搜索到2004~2013年网络反腐线索646条。再运用百度搜索引擎,对选出的642个案例有关信息进行搜索,全面了解每个案例的发生、发展过程,建立了由647个案

例组成的案例库。案例库建立以后,按照时间、事件发生省份、指涉对象级别、举报线索原发网站、举报方式、处理结果等指标对案例编码,进行数据化处理。

二、当前我国网络反腐发展趋势与特点

网络反腐案例增长迅速,网络反腐势头强劲,网络反腐社会影响不断扩大。

统计数据(表1)表明,2004年至2007年期间,网络反腐事件较少,最多每年不超过10件,2008年开始迅速发展,增速是比前一年多一倍。此后增速明显加快,2011以后每年达100多起,2013年前三个月就达113起。如果将数据绘制成发展趋势图(图1),明显可以发现三个快速增长点(2008、2011、2013)。由此,我们发现网络反腐发展主要受三个原因影响。

1.技术运用的“传染效应”。Mansfield技术扩散“传染病模型”指出,技术在企业中的扩散是一个模仿的过程,采用技术创新的企业越多,企业受到的影响就越大,因而采用技术的可能性就越大^[2]。2004~2007年网络反腐发展曲线上升比较慢,2008年出现第一个上升点,那一年陕西“华南虎事件”、南京“周九耕事件”、广州“林嘉祥事件”等网络反腐热点事件激发了网民反腐投入的热情,众多网民加入了这场狂欢式的网络反腐盛宴中。2012年以后,“房氏家族事件”、“官员艳照门事件”、“火箭提拔事件”等吸引了众多网友的眼球,上至省部级高官,下至村干部,被小鼠标拉下台的官员数量迅速增加,由此导致网民参与网络反腐的热情进一步高涨。可见,网络反腐具有“传染效应”,网民运用网络反腐行为增多,网络反腐取得成果越多,就会进一步激发网民参与网络反腐。“传染效应”的直接表现就是网络反腐案例迅速飙升,网络反腐呈几何级数增长。

2.草根领袖的“晕轮效应”。网络是一个“众声喧哗”的世界,然而又具有“非中心化”之后再“中心化”规律,网络舆论领袖在舆论议题的建构以及舆论走向上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因此,重大网络舆论事件大多呈现出舆论领袖发动与主导,普通网络积极跟帖,传统媒介深化报道的特点。网络反腐草根领袖不仅在贪污腐败线索披露中具有引领作用,而且在制造反腐网络舆论、吸引社会关注中发挥极大的作用,从而形成“晕轮效应”。相比2009年和2010年,2011年网络反腐案例增长速度更快,这与民间维权、反腐网站建立以及民间反腐力量同盟形成有着密切的联系。

3.权威力量支持的“助推效应”。网络反腐是民间力量对权力滥用的抗议与挑战,然而权威力量的支持与助推却是网络反腐的最大“政治机遇”。2008年出现第一个小高潮与网民积极参与有关,也与中央高层的重视密切相关。2008年6月胡锦涛视察人民网并指出,“通过互联网了解民情、汇聚民智”,是听取人民群众意见,集中人民群众智慧的一个重要途径。中央高层首次明确对网络意见正面表态,给予网民运用网络技术披露贪腐行为以重大的鼓励。十八大以后,新一届中央领导人反腐决心更大,更务实,“既拍苍蝇,又打老虎”,反腐爆料查处大大提速,反腐重拳频频出击,衣俊卿、雷政富、刘铁男等一批高官因网络举报而被查处。高层的重视直接助推了网络反腐的繁荣与发展。从网络反腐案例在全国各省市分布情况也可以看出,政府对网络反腐披露的腐败线索查处越多,该地区网络反腐发生的频率也越高。

表1 网络反腐案例年度统计表

年份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数量	1	2	3	7	17	43	42	112	182	2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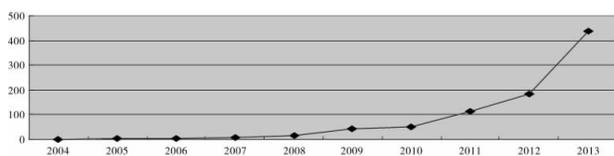


图1 2004-2013年网络反腐发展趋势图

(二)网络反腐案例地区分布不均衡极为明显

如图2所示,647例网络反腐案例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东部多、中西部少的特点,但从具体省市案例分布看,省市差别更大。广东网络反腐发生频率远远超过北京、上海、天津,比江苏、浙江发生的频率也高。湖南、河南等中部省份,甚至陕西那样的西部省份发生频率也远高于东部的北京、上海、天津、河北等省市。导致地区网络反腐发生频率不均衡性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1.与地方党政首脑及主要领导人网络意见的重视息息相关。广东网络反腐案例发生的频率在全国最高,反映了当时的汪洋和黄华华等领导特别关注网络民意。汪洋早在任重庆市委书记期间就被网民推举为“2007年度网络知识分子”,他主政广东以后,与广东省省长黄华华多次公开与网民见面,邀请网民拍砖,称赞网民朋友“有知识、有思想、有热情、有锐气”,虚心向网民求计问策,真诚接受网民监督。党政领导对网络民意的

高度关注,使广东在网络反腐运用、网络问政、政府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等方面走在全国前列。领导重视网络民意与地区网络反腐积极性的关联在湖南、河南等地也可以得到印证。2008年湖南株洲纪委书记杨平以实名介入网络反腐,并制定了国内第一个网络反腐的官方文件《关于建立网络反腐倡廉工作机制的暂行办法》,此后,湖南网络反腐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后来杨调离纪检部门后,湖南网络反腐频率明显减少。有“铁腕反腐”之称的周口纪委书记杨正超在当地比较有影响的“龙都论坛”实名发帖,表达自己反腐的决心,欢迎网友监督政府。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河南、湖南等中部省份网络反腐发生频率远高于东部地区的北京、上海、天津、河北等省市。

2.民间网络反腐精英起了重要助推作用。地方政府的支持为网络反腐发展创造了开放的政治机遇,因而是影响网络反腐的一个主要因素^[1],但这不是唯一的因素。民间网络反腐精英对于地区民间网络反腐力量的形成具有强大的示范作用。他们制造的网络舆论热点事件常被当地网民效仿,形成网络反腐的“晕轮效应”。“湘潭爆哥007”在微博上对湘潭“神女”、“神童”违规提拔事件进行曝光,引起网民对此类行为的高度关注,制造出一个“舆论兴奋点”,随后耒阳市副市长王卿、衡阳市雁峰区新任副区长朱松泉、常德石门县委副书记刘琼、岳阳市华容县女副县长赵群子等违规提拔问题被网民曝出,“火箭提拔”迅速成为一个网络热词。此外,民间网络反腐知名人士王培荣、李新德、观音士、高勤荣、朱瑞峰等人所在的江苏、安徽、湖南、陕西、河南网络反腐发生频率都较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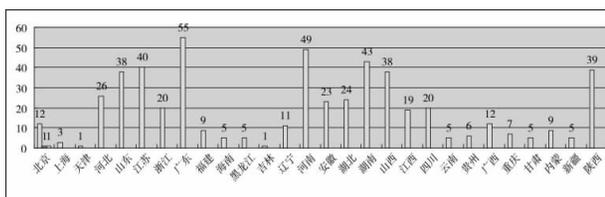


图2 网络反腐案例地区分布图

3.地方性网络社区的积聚效应也是影响地区网络反腐发生率的原因之一。地方性网络社区是网络参与地方公共事务的重要平台,也是地方公共问题讨论的主要空间。如果这些网络社区对腐败问题有较强的关注,那么就可能成为地方网络反腐的主战场。湖南省政府主办的红网、河南日报集团主办的大河网、周口日报主办的龙都网、江西日报社主办的大江网、西安华商网络传媒有

限公司主办的华商网、大秦网等,其中专门设置的网络反腐支持平台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网络反腐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河南、湖南、陕西、江西等中西部省份网络反腐发生频率相对较高。

(三)从指涉对象和披露腐败行为类型看,网络反腐更多的是“拍苍蝇”,难以治标

647个案例显示,网络反腐指涉对象省部级仅占2%,地厅级占12%,县处级37%,科级及以下占49%。网络反腐披露的腐败行为中,违规提拔(22%)、乱罚款或者网民称之为“收黑钱”(14%)、公车私用(12%)、萝卜招聘(12%)、包养情妇(8%)、公款旅游(8%)、豪华办公场所(5%)、超标用车(5%)、会议铺张浪费(4%)、拥有多套住房因而资产来源不明(3%)、公款吃喝(2%)、抽天价烟及戴名表等生活奢侈(2%)、吃空饷(2%)、采购腐败(1%),由此可见,网络反腐主要针对中低层级公职人员日常生活中“看得见的腐败”,难以触动权力寻租、官员财产等重大的贪污腐败问题。虽然网络扳倒了衣俊卿、刘铁男等省部级高官和段一中、单增德、杨达才、雷政富等一批厅级官员,然而这些成果大多都源于“情妇倒戈”或者“内部人爆料”,或者是一些内部人与网络反腐草根领袖、媒体记者合作,“窝里斗”才给网络创造了“打老虎”的机会。可以预见,在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化、权力运行阳光化之前,网络反腐虽然声势浩大,但是发挥的功能却极其有限。

全国性网络平台是网民反腐的主要阵地,虽然BBS是网民披露贪腐线索的主要方式,但是微博的反腐功能正在不断上升,未来可能成为网络反腐的主力。

从529个案例原发网络看,全国性网络平台占总比重58%,省级网络平台占17%,政府门户网站占15%,区域性网络平台(面向本市或县行政区域的网络平台)占11%;全国性网站内部分布天涯最多,占19%;百度其次,占18%;接下来分别是新浪(17%)、网易(9%)、腾讯(6%)、猫扑(2%)。网民大多选择在全国性网络平台曝光腐败线索,因为这些网络平台聚集的网民多、影响力大,更容易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成功可能性也就越大。从网民使用的手段看,BBS运用多达52%,网络问政23%,微博15%,博客8%,视频与新闻报道各占1%。然而,从动态趋势(图3)看,BBS、网络问政、博客、视频、新闻报道等方式曝光腐败行为比重正在逐步降低,微博反腐功能却在不断加强,可能成为未来网络反腐的主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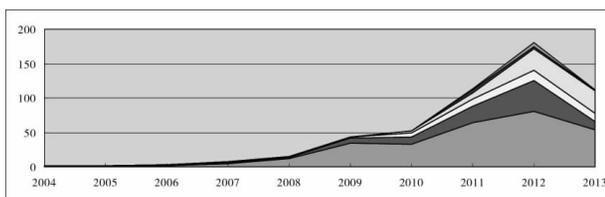


图3 网络反腐手段动态发展趋势图

(四)从效果看,网络反腐总体得到实质性处理的比重还是较低,民间网络反腐与政府权威部门反腐分隔依然严重

我们将网络反腐效果区分为四类:实质性处理,即网络揭露的腐败行为得到负面的处理;调查而无实质性处理,即当事单位、上级主管部门或者纪检机构组织调查,最后并没有做出实质性处理;一般性回应,即当事人或者涉及单位对事件作出解释,但没有组织正规的调查;无回应,即没有任何单位或个人对事件作出回应。按照这个标准进行统计(见表2)。网络反腐揭露的反腐线索只有22%得到实质性处理,而10%的调查没有结果,一般性回应的却占23%,无任何回应45%。这说明网络反腐成效并不高。如果从网络反腐成效与披露腐败行为类别之间的关系看(表2),包养情妇的实质性处理比重最大,其次是吃空饷、公款消费、住房来源不明、政府采购腐败等实质性处理比重也较大,而公车私用、超标用车、违规提拔等实质性处理比重则较小。

表2 网络反腐效果统计表

网络反腐类型	实质性处理	比重	调查而无实质性处理	比重	一般性回就	比重	无回应	比重	合计
超标用车	3	0.09	5	0.15	11	0.33	8	0.24	27
住房来源不明	8	0.35	7	0.30	6	0.26	2	0.09	23
公车私用	12	0.14	16	0.19	9	0.15	47	0.52	84
公款旅游	7	0.16	5	0.12	16	0.37	15	0.35	43
公款消费	15	0.52	3	0.10	7	0.24	4	0.14	29
官员奢侈品	2	0.11	3	0.16	9	0.47	5	0.26	19
豪华办公楼	3	0.06	3	0.06	19	0.39	24	0.49	49
会议铺张	5	0.33	0	0.00	6	0.40	4	0.27	15
乱罚款	11	0.12	3	0.03	21	0.23	55	0.61	90
包养情妇	36	0.69	5	0.10	4	0.08	7	0.13	52
萝卜招聘	20	0.29	9	0.13	12	0.17	28	0.41	69
违规提拔	11	0.09	2	0.02	29	0.23	83	0.66	125
吃空饷	7	0.54	1	0.08	1	0.08	4	0.31	13
政府采购腐败	4	0.44	0	0.00	3	0.33	2	0.22	9
合计	144	0.22	62	0.10	153	0.24	288	0.45	647

三、加强网络反腐建设的对策建议

虽然当前网络反腐形势发展如火如荼,网民参与积极性空前高涨,网络反腐斩获颇丰,但是,网络反腐依然存在很多问题。一方面,网络提供的反腐线索良莠不齐,网络反腐法律身份确立和网络举报人权利保护,网络反腐线索查处制度化操作,网络反腐与官方反腐的融合等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解决;另一方面,过分关注情妇反腐等花边新闻可能使网络反腐沦为情妇反腐的“观淫”闹剧,缺少约束的网络秩序也可能使网络反腐被某些草根领袖异化为要挟公务人员、谋取非法利益的工具,或者被某些个体利用,成为打击竞争对手、争权夺利的工具。网络反腐是把双刃剑。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应该压制网络反腐,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使网络反腐发挥其正功能的同时避免消极影响。因此,从现代反腐败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与国家反腐败治理能力提升的角度,通过制度化的途径,规范并引导网络反腐行动,建构国家与社会在权力监督和腐败治理中的良性互动机制,这是当前加强网络反腐建设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

第一,转变反腐观念,从工作机制创新、力量体系重构、制度化建设破局的高度认识网络反腐对建立现代反腐败国家治理体系的重大意义。网络反腐在权力反腐之外开辟出一个新的反腐战场,掀起了一场全新的社会反腐运动。网络反腐的发展为促进权力反腐与社会反腐相结合创造了条件,形成了倒逼反腐制度化建设的社会压力,为反腐治理体系建设创造新的契机。2009年新修订《党的建设辞典》将“网络反腐”作为新词条收入其中,网络反腐完成了从“洪水猛兽”到“新型反腐模式”的艰难转身,但是网络反腐对于反腐工作机制创新、反腐力量重构、反腐制度化建设等方面的重大意义还没有得到深刻的认识,特别是基层工作人员,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对网络反腐的排斥、抵制心理。

第二,加强网络反腐制度化建设,加快网络反腐与权威反腐融合,建立权力制约和社会制约相结合的现代化权力监督体系,建立健全现代反腐败治理体系。当前,权威机关反腐总体上偏重大案要案的查处,权力监督制度化建设相对不足。虽然反腐机关对腐败行为一直保持高压的打击态势,但是却难以从源头扼制腐败的蔓延与扩散,腐败行为呈现出屡禁不止、前仆后继的怪象,给公众造成腐败越反越烈的错觉,刺激公众对腐

败问题的高度关注,也更进一步激发了其网络反腐的热情。然而,网络反腐成功往往依赖于网络焦点舆论形成与媒体大量报道所形成的巨大舆论压力,网络反腐陷于“媒治”的窠臼之中,难以走上制度化、常态化、法治化的坦途。这必然导致权威机关反腐能力与网民不断高涨的反腐需求之间巨大的落差,难以形成权威反腐与社会反腐良性互动。

自200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设立了全国检察机关统一的举报网站开始,经过十年的发展,新华网、人民网、光明网、中国广播网等各大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新浪、搜狐、腾讯、网易等主要商业网站设立直通中纪委、中组部等权威反腐机关的“网络举报监督专区”,“重要网站—权威机关网络反腐信息收集平台”联动机制开始形成。湖南、河南、山西等一些地方政府也开始网络反腐制度化的尝试。然而,一些政府官员、专家学者或是出于既得利益,或者出于对网络反腐某些负面问题的过分忧虑,对网络反腐表示怀疑、抵制,顶层制度设计空缺,制度建设的内在诱致动力不足,这些问题导致网络反腐存在严重的“制度失衡”问题,民间网络反腐与权威反腐“冰火两重天”^[3]。

因此,加强网络反腐制度化建设,关键要解决两个根本性问题:(1)强化顶层设计,解决网络反腐制度化动力不足问题。虽然中央高层高度重视网络举报对反腐倡廉的重要意义,希望通过网络反腐制度化建设拓宽反腐公众参与,但是,缺少顶层制度设计,没有自上而下的压力,地方政府网络反腐制度化建设动力不足的问题依然难以解决。(2)建立健全网络反腐信息收集制度、网络反腐查处制度、网络反腐回应制度、网络反腐权利保护制度,形成网络反腐操作规范体系。制度既是确定性的预期,也是规范化操作系统,只有完善了这些制度,网络反腐才能常态化、法治化,权威反腐与网络反腐良性互动才有可能实现。

第三,提升政府网络反腐能力,开创民间反腐与权威反腐良性互动的新局面。从运动反腐到权力反腐再到网络反腐运动,权威机关反腐工作机制与反腐形势之间矛盾日益突出,网络反腐虽然取得了局部性胜利,然而这些成绩却付出了因舆论危机导致政府形象严重损失的代价。提升网络反腐能力,形成官方反腐败与民间反腐互动的良好格局,必须解决这样几个问题:(1)加强网络反腐线索搜集能力。没有专业人员、专业技术和专门的工作机制,及时掌握网络反腐舆情信息几乎是不可能,尤其是市、县一级纪检机关专业技

术掌握、专业设备配置、专门人员配置方面存在较大欠缺,信息来源依靠上级部门通报或人工获取,信息收集能力与高速的网络传播极不匹配。(2)强化网络反腐信息整合能力。在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主要商业网站建立了监督举报专区,按照分管原则对重要网站网络反腐线索进行整合,但是信息整合力度还不足,省级以及省级以下政府反腐信息整合能力更是严重短缺,不同行政层级网络反腐信息整合与联动机制尚存巨大空洞。(3)提高网络反腐信息研判能力,加快网络反腐介入速度。政府权威部门行动必须慎重,不能被网络牵着鼻子走,但也不能等网络舆论演变成危机之后再收拾残局。只有加强信息研判能力,才能提高介入速度,才有可能争得主动。(4)提升网络反腐舆情引导能力。权威舆论场与民间网络舆论场如何互动,关键在于政府话语权如何渗透到网络舆论场之中。洞悉网民心理,深谙网络话语之道,是提升网络反腐舆情引导能力的根本。

第四,提升网民理性能力,净化网络反腐舆论环境,依法引导和规范网民反腐行为。制造新闻博取网民眼球,猎取新奇舒缓生活压力,发泄情绪排解现实生活不满,借网络反腐谋取非法利益等等,严重影响了网络反腐应有的功能。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着手于:(1)依法确认网络反腐的“名份”。虽然党和政府承认网络监督的反腐功能,但是现实操作过程中,网络举报不属于法定举报行为,网络举报人的权利得不到有效保护,网民曝光腐败行为有可能遭遇权力的打击报

复或者恶意诉讼。这就会导致匿名举报成为网民举报的首选,因为匿名盛行助长情绪发泄,更容易使人性中的弱点放纵,这又进一步加剧了非理性行为在网络反腐中的蔓延,助长网络反腐的无政府状态。(2)合理运用法律强制性规范和网络自律双重手段,引导并规范网络反腐行为,没有自由将没有网络的发展,同样,没有秩序网络自由也不复存在。引导并规范网络反腐行为,一方面要加强网民反腐权利与言论自由权利的法律保护,又要明确合法与非法的界线,通过完善网络立法切实保障正当的网络反腐行为,打击借网络反腐之名的非法行为;另一方面又要积极培育网络自律精神,提升网络虚拟社区自我约束能力。(3)加强公民文化建设,提升公民理性判断能力和商谈能力。网络反腐本质是公民政治参与的一种形式,没有良好的公民道德品质,没有理智的判断,没有理性辩论能力,网络反腐负面因素就会急剧膨胀。以权利保护为核心,强化公民文化建设,是净化网络反腐败舆论环境的根本。

参考文献:

- [1] 杜治洲,任建明.我国网络反腐特点与趋势的实证研究[J].河南社会科学,2011(2).
- [2] MANSFIELD E. Technology change and the rate of imitation[J]. *Econometrics*, 1961(29):741-765.
- [3] 胡杨.网络反腐的制度化路径分析[J].河南社会科学,2011(1):48-52.

(责任编辑 张海荣)

Abstract The online Internet anti-corruption refers to an initiative in which Netizens reveal corruption clues by Internet, whip up public opinion and oversee public power by Internet. By the approach of keyword search of Baidu, Google and other search engines, this paper collects 529 cases of Internet anti-corruption from 2004 to 2013, analyzes, by encoding these cases and processing data, the trends and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current Internet anti-corruption from several aspects, such as the overall trend,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website distribution, involving objects, and the results of Internet anti-corruption and propose countermeasures for further strengthening Internet anti-corrup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uilding a modern governance system of anti-corruption and enhancing the capacity for anti-corruption.

Key words Internet anti-corruption; trends; empirical; touch internet; Halo effect; rocketing promotion